

从传统走向现代： 一个江南市镇社会结构在近代的嬗变

郎友兴

(浙江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对于近代中国的变化, 学术界以往较多关注于宏观上, 至于乡村社会包括市镇的变迁则研究较少。如果对乡村社会变化缺乏了解, 那么, 也就难以对宏观有准确和深刻的认识。通过对南浔的社会结构(职业与阶层、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研究, 可以揭示出传统的江南市镇在中国近代转轨过程中如何变化发展。研究发现, 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相比, 南浔社会结构的变化要缓慢得多, 并且只是局部上的变异而非整体性的转型, 但是, 这些变化本身表明高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松动了, 并开始向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演进。

[关键词] 南浔; 江南市镇; 社会结构; 近代; 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12.6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3-0145-08

1840 年以来, 西风东渐, 以近代工业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冲击, 促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而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逐渐变化, 是这一历程在社会基层的一个表现, 构成了中国社会近代转轨的重要一幕。本文所讨论的是一个江南市镇——南浔镇——社会结构在近代的变化及其状况。从社区背景来看, 南浔是江南市镇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市镇, 它是浙江省湖州市的著名市镇, 位于太湖之滨, 与江苏相邻。明清以来, 南浔一直是生丝贸易的重要中心, 可以作为江南商业性市镇的代。自近代以来, 以南浔为代表的江南市镇在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的结构性变化, 本文拟从职业与阶层结构、社会群体(主要是家庭与婚姻结构)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以期对这一课题形成一个大致研究概貌。

一、职业与阶层结构

随着近代工业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传统江南市镇在职业、阶层结构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异, 尽管其变化较微弱, 但却颇有意义。

首先是市镇士绅阶层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士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自晚清以来, 由于受西潮影响和冲击, 士绅阶层身份的内涵已逐渐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最具有近代意义的是清政府于 1905 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 这样原先形成传统士绅阶层的最主要的途径已不复存在, 新式的知识分子取代了旧式的士绅阶层。南浔向来以文风昌盛著称,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 旧式的士

[收稿日期] 2004-10-2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Z95F04)

[作者简介] 郎友兴(1964-), 男, 浙江临海人, 浙江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乡村社会与政治、西方社会理论以及民主与民主化问题研究。

绅开始产生分化,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新式的近代知识分子。南浔不少巨绅皆以经营丝业而致巨富,跻身于士绅阶层,他们中的一部人深受对外贸易兴盛与上海风气的影响,成为市镇中最早接受西方观念、摒弃传统局限的先驱者。如金氏家族以经营丝业而致富,是南浔“八牛”之一。金焘为清同治十年(1871)秀才,增贡生,做过浙江省缙云县训导,金焘忧于世变,所以将子女送往欧美留学。金绍城为金焘的长子,他留学于英国的铿司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光绪末毕业后回国,1904年任上海中西会审堂会审官。金绍城即南浔新式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尤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原先有功名的士绅,由于受新学之熏陶,弃旧从新,因此出现了新旧兼具的士绅,有学者认为,此“为清季民初士绅阶层转型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在浙省亦见于甚多偏僻的县份”(11 p.544),南浔镇的王文濡、徐一冰是其中的典型。

其次是工商阶层队伍的扩大与地位的上升。晚清实行“新政”以来,工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清政府采取了一些对成功的经商者赏以官爵品位的措施;人们的认识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上甚至以“绅商”并称。清末,南浔即有数人得封“商爵”。比如,庞氏家族以经营蚕丝发家,为南浔“四象”之一。庞云曾曾经以他的儿子庞元济的名义向清政府捐献了十万纹银,所谓赈捐豫直灾情报效,由李鸿章奏奖,于光绪十七年(1881)得慈禧太后恩赏庞元济举人,特赏庞云曾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当然,市镇中从事工商业的人数的增长,主要还是由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的。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上海的开埠,南浔成为湖丝运销上海的中心,丝市繁荣,到了光绪年间,出现了“同、光间繁荣富甲浙右”的局面。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南浔镇从事工商业者的比例约占各类职业人口的44.5%。

表 1 1946 年吴兴县南浔镇区人口职业构成表

类别	无职业					有职业					
年龄、性别 与 职业类别	合计	农	工	商	交通 运输	公务	自由 职业	人事 服务	其他	比例 (%)	
合计	3 826	9 318	324	331	4 099	68	375	108	3 375	638	100
男	1 212	5 706	267	284	3 971	68	216	72	225	603	52.6
女	2 614	3 612	57	47	128	0	159	36	3 105	35	47.4
比例 (%)	29.1	70.9	2.5	2.5	31.0	0.5	2.9	0.8	25.7	4.9	

* 资料来源:《吴兴县南当镇第二保户口清册》,现存于湖州市档案馆,全宗号 313,案卷号 4—2。

第三,新职业的产生与阶层结构的变化。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欧风美雨的冲击、新型机构与新行业的兴起,为人们谋取新的职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条件,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团体。这一变化在南浔表现得较为明显(表1有清楚的反映)。最有意义的是,出现了近代的产业工人。1919年庞元济等人创办浔震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梅履中创办梅恒裕丝厂,1926年朱云裳等合资创办南浔汽机改良丝厂,这些即南浔早期的近代工业,并由此产生了近代的产业工人。如梅恒裕丝厂,创办时有女工四百余人。表1中的数据表明,南浔镇从事近代工业的产业工人已经约占职业人口的3.6%。较为有趣的是,在这些工人中有可能隐含着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另一种意义的变化。像梅恒裕丝厂的女工,尽管没有太多的第一手资料证明她们来自于镇区外的乡村,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市镇与农村人口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同,市镇上的工人有可能常常是当地的农民。南浔等江南乡镇郊区的农民弃农从工,农业人口流向非农业地区,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农村的人口压力和土地制度。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职业。首先出现了近代意义的自由职业者。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员主要是教师、医生、编辑、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律师,等等,他们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其原因在于“产业革命、工商业的发达、都市的发展”。例如,1949年前,南浔个体开业的中西诊所与医院共计二十多家,医务人员五十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南浔还出现过一报一刊,出现了从事编辑与新闻工作的人员,这对于一个市镇来说是件不简单的事。当然,自由职业者在市镇职业结构中的比例还是较小的。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即便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浔镇,自由职业者总共只有108人,其中男性72人,女性36人,约占有职业人口的0.8%。其次,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务员:传统的官吏转变为近代的政军、警、党等公务人员。如表1中的数据所示,南浔镇有公务人员375人,占有职业人口的2.9%。公务人员主要是镇公所、自治会、税务局、洋药局等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团防局、自卫军、警察所等军警人员。第三,人事服务行业有了新的发展。这既包括人数上的增加,同时新兴的服务行业在市镇中也有了发展。其时南浔的人事服务业从业者竟有3375人,占有职业人口的25.7%,仅次于经商者(见表1)。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南浔这个江南市镇是个消费型的商业市镇,因此对人事服务业有相当大的需求。新的服务业包括邮政、电信、汽车与轮船客运业。南浔较早地拥有了近代的通信与运输系统。

此外,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加入到就业者的行列。妇女的从业改变了市镇原有职业的性别构成。在南浔,职业妇女主要集中于丝绸纺织业与人事服务业。例如,民国13年(1924),丝商梅履正在南浔创办了梅恒裕丝厂。该厂的前身是改良缫丝传习所。梅恒裕丝厂资本有27万两白银,有意大利式的缫丝车240台,女工400余人。又如1946年在南浔从事人事服务业的女性有3150人,占全部人数的93%。

职业的改变与阶层的变动,标志着社会流动的发生,而社会流动或者职业的变化常常被视为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近代以来,类似于南浔这样的江南市镇的就业范围与机会的变化和社会流动趋向的逐步扩大,不仅表明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也表现出近代江南市镇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二、家庭结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市镇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要了解近代南浔这样的江南市镇社会结构的变迁,不能不关注家庭结构的状况。由于家庭与婚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婚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家庭的结构。

家庭规模通常以家庭的人口容量即人口数来衡量。林黎元《南浔史略》中提供的资料表明(见表2),1929年南浔镇的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为4.7人。有几个镇户均人口数较低,像运河下镇、南东镇、南西镇户均人口数分别为4.3、4.2、4.0。其人口规模小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近代江南传统专业经济的衰落,这一情况在南浔最为典型。南浔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20年,湖丝出口的兴盛时期,人口达到顶峰,有四万人左右,当时有不少人口迁入南浔。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湖丝贸易的衰落,南浔镇的人口出现外流。二是当时在南浔经商的,有些是不带眷属,或只带少量的家人。根据1948年《吴兴县南浔镇第二保户口清册》统计,南浔镇第二保共有169户,738人,户均为4.4人。所以,可以估计,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接近5人。这与不少史家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家庭规模户均所作出的5人左右的估计是相一致的。另外也可以从1931年《无锡县第四区农村经济调查》中的人口数据得到印证:1931年,无锡县第四区五个市镇区家庭人口平均为4.85人^{[2]P.276}。

表 2 1929 年南浔的家庭人口状况

镇名	户数(户)	人口(人)	户均人口数(个)
运河上镇	630	3 399	5.4
运河下镇	691	2 963	4.3
南东镇	933	3 959	4.2
南西镇	993	3 945	4.0
东北镇	606	3 315	5.5
西北镇	370	2 308	6.2
合 计	4 223	19 889	4.7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现时最大多数人民仍未脱离宗法社会的大家庭制度”,但是,这种大家庭占优势的观点与有关资料并不符合。费孝通根据 1936 年开弦弓村的资料,对其中各类家庭类型进行了计算,认为在中国农村不可能是大家庭占多数^[31 p.33]。而且,从上面南浔与无锡等地的家庭规模的资料来看,费孝通在《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中提出的所谓大家庭多见于市镇这一看法也未必符合有关资料,至少是有些江南市镇的情况值得重新考虑。1947 年,南浔镇第二保共有 169 户家庭,在这些家庭中,兄弟未分家而合居的只有 3 户,占全保户数的 1.8%,而三代同堂即儿子、儿媳与公婆合居的仅 10 户,占全保户数的 5.9%,其中还包括第一代已丧偶的即扩大的核心家庭 3 家。全保各户家庭规模人数在 10 人以上的只有 3 家,就是在这 3 家中,有 2 家实际上是店铺,所谓家庭成员多为伙计。所以,市镇的家庭规模与农村并无多大的区别,都是以扩大的核心家庭为主要类型。当然,相对而言,由于农村地区的富户不少聚居于市镇,他们较一般的农户可能更多地维持着大家庭的形式,从而使得市镇的大家庭类型比乡村略多,这也许就是费孝通先生认为大家庭多见于市镇的原因吧。不过由于这类富户的户数有限,对于提高市镇大家庭类型比例帮助不大。并且,由于市镇与农村在居住条件方面有所不同,也造成了市镇与农村在聚居形式上的一些差异。当然,不能将这些差异视为市镇比乡村有着更多的现代性的原因。

南浔镇的家庭结构在近代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增强了家庭的现代气息。

第一,婚龄的推迟。婚龄反映人们结婚的早晚,也是影响家庭结构的一个因素。由于文化与经济等多种原因,主张早婚早育、多子多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不过到了清末与民国初,婚龄有所推迟。这种变化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一是立法上的改变,从晚清到民国,都将男女成婚的最低年龄定为男 18 岁,女 16 岁;二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由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女子读书而引起观念的改变,尤其是上海等大都市近代文化的辐射,以及妇女进入工厂工作等因素的影响,加上不少进步人士对传统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与男尊女卑等观念进行批判,提倡男女平权、反对早婚等进步思想,对于推迟婚龄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与过去相比,在近代,南浔镇的婚龄是推迟的。将 1947 年的吴兴县南浔镇人口婚姻状况(见表 3)与同时编制的《吴兴县南浔镇人口年龄性别统计表》结合来看,当时南浔镇区人口中,男性未满 18 岁已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不到 1%,18—19 岁已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的 34%,20 岁之后已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的 5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在 20 岁左右;女性未满 16 岁已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不到 1%,16—19 岁已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的 41%,20 岁之后已婚人数约占本年龄群体总人数的 68%,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女性的初婚年龄大多在 19 岁前后。南浔镇的数据是否必然反映了江南市镇人口普遍存在初婚年龄推迟的现象,有待于进一步资料的发掘。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市镇人口初婚年龄推迟现象已经在近代江南的市镇中出现。

表 3 1947 年吴兴县南浔镇人口婚姻统计表

年龄性别与婚姻类别		未婚		已婚		
			合计	有配偶	丧偶	离婚
总计	合计	1 457	8 614	7 912	658	44
	男	828	4 428	4 016	396	16
	女	629	4 186	3 896	262	28
未满 18 岁	男		29	29		

* 资料来源《南浔镇人口婚姻状况统计》（1947 年 12 月 30 日）现存于湖州市档案馆，全宗号 313，宗卷号 4—2。

第二，妇女地位的提高与家庭关系的变化。在大都市的影响之下，像南浔这样得风气之先的市镇，社会风气逐渐开化，慢慢地接受起“自由”“平等”“婚姻自主”等新观念，出现了男女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的事例，婚姻自由相对扩大。与此同时，尽管从总体上说婚姻比较稳定，离婚率很低，但是离婚率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上升较快，引人注目。中国传统社会中，在离婚问题上表现出极度的不平等，妻子提出离婚为礼法所不容的。而到了近代，妇女提出离婚一方面表明妇女运动的兴起与深入，另一方面表明了妇女地位的提高。表 3 中的数据表明，南浔镇在总计 44 个离婚人数中，女性主动提出有 28 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女性离婚率高于男性，反映了在家庭关系中妇女主动性的提高。费孝通也认为，“妻子从丈夫处分离出来会使婚姻的关系松散”（41 p.176）。事实上，社会经济中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引起家庭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妇女地位的提高而发生的。

三、社会组织

罗兹曼等人在其所开出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清单”中，列出了基层行政、教育、商业、宗教、公共事业与非法会社组织等六个组织（11 pp.220—221）。在近代江南市镇的变迁中较为明显的社会组织有政治、商业与公益团社等，它们代表着市镇社区调控系统的主要机制。不过这里对社会组织的理解是狭义的，即不包括政治组织，因此，考察的主要是南浔的商业组织与公益组织。

（一）会馆、公所与商会力量的崛起

明清以来，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繁荣，城镇的公所、会馆等工商团体日益活跃起来。南浔因其商业经济的发达，公馆、公所亦较早较多地出现，并由丝商庄祖绶等发起，于 1865 年经浙江布政使批准成立了南浔丝业公所。此外，在南浔还建有客居此地的各种团体，如宁绍会馆、闽公所等。

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随着西方经济的冲击、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同业公所、同业公会、同乡会馆等带有传统行会性质的商业组织、社团逐渐发生变化^[5]。当时清政府对官督商办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种种弊端有所认识，并于 1903 年新设了商部，以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就组织的特点而言，商会不同于以公所、会馆为代表的传统行会组织。尽管仍存在着行会的一些残余，与公所、会馆等有着血缘的关系，但商会毕竟是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工商社团。

1916 年，由丝业公会董事梅展中等发起，仿上海的商业组织，南浔成立了镇商会，并于民国 10 年（1921）八月，经北京农商部批准，颁发钤记。南浔镇商会的基层组织为同业公会，包括南浔镇商会、丝业同业公会、酱酒业同业公会、洋广京等。到 1932 年，南浔加入商会的商店数从 1922 年的 172 家增加到 232 家，按其有关规定，入会的商店每年应缴纳银数，最低的 8 元，最高的为 40 元。

市镇商会的活动从总体上说与大中城市大体上相同，不同的是，由于乡村市镇自清代以来官方行政机构建设较为薄弱，虽然行政权力一直努力向下渗透，但是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并没有大

的成效。因此,市镇的商会在一定时期里弥补了权力的空缺,在有些市镇,商会很可能成为市镇社区的权力中心,俨然是地方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总管。根据 1946 年的《南浔月刊》报道,南浔镇商会附设了多达 32 个机关。有意义的是,这篇“巍巍商会,设有机关三十二”的报道中将镇公所、镇民代表会等政府机构和乡农会、渔会分会、教育会、妇女会等其他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全归入到镇商会的机构行列。显然,这不是报道的失误,而是反映出当时南浔镇商会的实际地位。

(二)公益组织的发展

近代以来,各阶层积极参与地方的建设,因而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与传统时期相比有了新的特征。南浔由于毗邻口岸城市,深受近代文化的影响,其组织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与特点。

首先,出现了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公益组织机构。这主要指在义仓等传统形式之外,产生了一些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自强、改进地方文化等的公益组织。成立于 1928 年的南浔游民习艺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专收本镇的游民与不务正业、扰乱社会秩序或安宁的子弟,所里设立工场与布厂,教授他们纺织技术,为期一年。

其次,公益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呈现出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趋势,这是近代社会变迁在公益事业中的反映。南浔游民习艺所制定了《南浔游民习艺所简章》,计有十三条,内容涉及到设立目的、入所的条件及报酬等。贫儿院并非近代的产物,不过江南市镇里的一些贫儿院,其运作与管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南浔贫儿院成立于民国 3 年(1914),制订了较为详细的规程,像贫儿院作息时间、读书科目、入院规则等。规范化与制度化是社会组织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尽管其变化有限,但是体现出来的现代因素还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公益组织支持的力量多元化。除了政府对社会慈善公益组织机构的倡导、表彰、奖励、支持以外,近代江南市镇公益事业得到商人、教会、乡绅、寺院、商会、市镇上层人物的支持,而工商业人士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到 20 世纪 30 年代,南浔镇的慈善机构之经费大多数由镇上大家族、富商资助(见表 4),其他公益事业也与刘、张、庞等的资助分不开。由于支持力量的多元化,江南市镇的公益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公益组织也日益显示出其民间化的色彩。

表 4 南浔镇慈善机构经费数目与来源情况表

机构名称	经费数目(元)	经费来源
贫儿教养院	4 000—5 000	各种捐募
育婴堂	3 200—4 000 余	庞、刘二氏捐助
承济善堂	6 000	庞氏负担
老人堂	20 000	刘、张、庞三氏捐助及房租营业税款
游民习艺所	3 000—4 000	刘、张、庞三氏捐助
师承善堂	5 000	刘、庞二氏捐助
义仓	建记屋、棺材等丝款	官府拨

* 资料来源:《南浔研究》(1932 年),现存于湖州市档案馆,全宗号 313,案卷号 7—20。

四、结 论

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相比较,社会结构的变化要缓慢得多。但是,鸦片战争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那以后,高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松动了。从南浔的变化与发展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近代江南市镇的职业与阶层、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诸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尽管是缓慢的,但是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因此,尽管近代南浔社会结构之变化只是局部上的变异,

而非整体性的转型，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但是，这些变化本身表明了高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松动了，开始向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演进。当然，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说，近代的百年历史是十分短暂的。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曾骅、南浔镇《南浔开发报》主编睦桂庆、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项辉等人的帮助，谨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1] 罗兹曼.中国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2]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
[3]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4]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4[J].(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44）544.
[5]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何海峰]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 A Case Stud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 of a Small-town in Modern China

LANG You-x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After 1840 China began to enter a modern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its social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 China 's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evolved gradually ,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 its way to modernization didn 't run smoothly , for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values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made impact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raditional small-town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for example ,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witnessed the gradual change of their social structure and life , especially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368—1911). The said change—a manifestation at the social basic level—wa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China 's social transition in modern tim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or evolution of Nanyun , a small-town in the Jiangnan in China 's modern times (1840—1949) by examining three aspects of social structure : occupations and strata , family structure ,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data set for this research comes mainly from several local chronicles and local newspapers published in the 1930s and 1940s , archives , a survey report conducted in 1932 , and the author 's own fieldwork.

The career women in Nanyun worked mainly in the silk spinning industry and service. First of all , a key finding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re emerged some new occupations that to some extent changed Nanyun 's traditional stratum structure. Traditionally , scholars , peasants , workers , and businessmen comprised China 's social strata. But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w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y that had an impact on rural society , resulting in some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gentries became a new stratum : modern intelligentsia. Also ,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orked in the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sector increased with a corresponding rise in their social status. At the same time , there appeared some new occupations such as modern industrial workers and professions in Nanxun. Interestingly , the women in rural China began to join the work force , forming an integral part of it. The career women in Nanxun worked mainly in the said industry and service.

These occupational and social strata changes came to affect family relationships , and in turn reflected these changes. The family structure in Nanxun also experienced a slight change , some practices of the modern family influencing the practices in Nanxun tow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rriageable age in Nanxun deferred , while women ' status had risen , resulting in changes in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In particular , the increase in women 's finan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ir rise in social status led to changes in terms of their rights within the family. At the very least , the former family rights model with husbands and their mothers (or their wives ' mothers-in-law) playing a dominant role had become flexible , indicating that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in modern commercial towns was shift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n equal rights model.

The paper also finds some changes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articularl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Nanxun , which indicates the birth of a nascent non-governmental society in Chinese small-towns. On the one hand , traditional guild-halls (huiguan) and trade councils (gongsuo) were transformed into modern chambers of commerce. On the other hand , some distinctive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structure and activities ,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a pluralistic support base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Nanxun began to appear.

Finally ,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alms ,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modern Nanxun was much slower and less extensive. Nevertheless , the changes in the three areas outlined above imply that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in Nanxun had undergone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 one that would bring it in the direction of a more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 : Nanxun ; small-town ; social structure ; modern China ; change

本刊讯 : 2005 年 3 月 6 日 , 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与企业的作用”中日双边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以及日本名古屋大学、爱知淑德大学、国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丰田汽车公司等政府、企业界人士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研讨会以“产业高度化”为视角 , 就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构建和经济发展进程中企业的作用展开了讨论。与会学者对东亚地区产业高度化的理论与经验、产业组织与产业政策、企业组织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论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会人员一致认为 , 以研究机构为主体实施的双边“外交”——对外交流机制 , 不仅能更好地推动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 而且通过吸收政界和企业界的参与 , 将有效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开展。

本刊讯 : 2005 年 3 月 16 日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 (IDEI) 签订了关于成立“中法能源经济学联合研究中心”的协议 , 决定联合筹建“中法能源经济学联合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能源供应间的矛盾 , 应对目前亟须变革现行能源供应体制并将这种以市场机制为目标的体制改革逐步从电力部门扩展到石油、天然气等其他能源部门而筹建的。该研究中心将主要承担能源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能源部门的应用与政策研究 , 并组织相关培训与教育。具体研究项目包括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与规划、我国电力体制的改革与建构、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中国能源部门的规制与竞争体制的建构、能源部门的培训和教育项目、经济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及其他相关研究项目。